

吴文化视野中的

浙西现代作家

□ 徐可 著

远方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吴文化视野中的 浙西现代作家

徐 可 著

远方出版社

绿原文丛

主 编：陈广斌

责任编辑：苏 文

封面设计：周又周

吴文化视野中的浙西现代作家

著 者 徐 可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三星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80595 - 888 - 2/I · 340
定 价 22.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绪论	(1)
一、研究命题的提出	(1)
二、吴文化与浙西现代作家的界定	(8)
三、研究价值和意义	(11)

上编：总体风貌

第一章 文化之根	(21)
第一节 人文地理环境	(22)
第二节 渊源与流变	(34)
第三节 吴文化形态	(43)
第二章 精神取向	(53)
第一节 开放创新与坚韧执著	(53)
第二节 平和冲淡与率性自由	(94)

目 录

第三章 艺术思维	(108)
第一节 感悟	(109)
第二节 性灵	(117)
第三节 精雅	(127)
第四章 审美表现	(137)
第一节 抒情的“南方写作”	(139)
第二节 尚美的艺术视角	(147)
第三节 “甜软”的语言形态	(153)

下编：个案实证

第五章 江南的印迹

——茅盾论	(165)
第一节 文本版图：地域情缘的展现	(167)
第二节 文学世界：江南气质的流露	(175)
第三节 文化心理：“女性”化审美倾向	(183)

第六章 长天渺渺一征鸿

——郁达夫论	(192)
第一节 愤世嫉俗的时代呐喊	(193)
第二节 自然本真的性情中人	(201)
第三节 “水性”的艺术思维	(210)

第七章 秋空的一缕行云

——徐志摩论	(222)
第一节 浪漫的诗魂	(225)

第二节	一道跳着溅着的生命水	(237)
第三节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249)
第八章	一钩新月，天如水	
	——丰子恺论	(259)
第一节	人淡如菊，我心悠然	(261)
第二节	谐趣人生，诗意盎然	(270)
第三节	琐屑平凡，意蕴深远	(281)
参考书目		(289)
后记		(293)

绪 论

一、研究命题的提出

文学存在地域性，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区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地域一般是从古代沿袭而来的，地域文化也由于历史的文化发展而形成其特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续下来。它在保留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结构的背景下，带有独立性、地域性和特殊性等特征，更多地体现着地区性的风俗传统、心理状态、生存方式和行为观念。

从世界文学的发展来看，关注地域风貌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创作，早就不是一种鲜见的开创。早在 1800 年，法国文学史论家斯达尔夫人就认为：“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

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①（她还说，北方诗歌是想象的，沉思默想、崇高伟大的诗歌；南方诗歌则是情绪的，追忆快乐、耽于安逸的诗歌。“英国诗人还是保留了北方的想象，保留了这个喜爱海滨、喜爱风啸、喜爱灌木荒原的想象……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②斯达尔夫人描述的轮廓虽然比较粗疏，但她从地区文学的角度，直接把握住欧洲南、北方文学的内在精神气质，显示出理论的灵性和准确度。1865年，法国文学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荷兰为例论述了地理环境与艺术创造的关系。他认为，由于荷兰人“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在他们身上找不到英国人“阴沉而威严的骄傲”和美国人“过于好动的习惯”。^③他还在论述意大利人和一般的拉丁民族的想象力时说：“表现这种想象力最完全的两大民族，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

①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②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7页

③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①两位学者的论述，都说明了水土的不同对人的气质乃至艺术创作风格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生存其间的人们不同的秉性和精神面貌，在世界各地类似的状况比比皆是，中国亦是如此。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风尚复杂多样，历史上就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有南北风格不同之论。大量的文学创作实绩证明，地域环境和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一种依存关系。地域文化观念的萌生，应该说是非常古老的。南北文化区别之论，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礼记·中庸》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②郑玄对此注说“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早在《左传》襄公十八年的记载中，已经出现了“北风”和“南风”之语。汉魏六朝乃至唐宋之后，人们更是能够自觉地从文学思想领域去区分南北不同的文风。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早就受到文论家的关注。如刘勰《文心雕龙》在《物色》篇中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

①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② 崔丽编校：《四书·中庸》，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①初步论及了自然环境对于形成不同文学风格的作用和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南北文化区域的划分，主要根据南北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使活动于其中人的气质、性格、心理也随之各异，进而影响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形态及其性质的差异。这种地缘南北的文化区分，固然因为南北地理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差异而客观存在，但也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南北分立的局面有关，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综合的地缘文化因素，深深地影响着文学艺术创作。如魏晋南北朝南北方的分立，因为政体裂为两块，因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北差别的文化地理依据和标志。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文学重心由北南移。此后所谓六朝文学或南朝文学作为生长的中国南方文学，不仅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而且自六朝以后始终占据着优势的位置。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基本上是以阴、阳来剖析中国两个最大的区域文化场，他谈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两端；民尚虚无，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②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学在

① 刘勰：《文心雕龙》，向长清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② 刘师培：《刘师培全集·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册，第557页。

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南北形态的差异，全面而深刻地梳理了南北两大地域文化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关联。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也说：“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① 两位学者从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圈的具体特点出发，说明了水土的不同对人的气质乃至艺术创作风格的影响。当代学者在研究我国南北文化的不同特质时也认为：“中国文化向来有南北之分，即北方是实用的、政治的、道德的，而南方则是飘逸的、艺术的、审美的。”^②

从地域学、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从地域文化出发的文学研究，也是“其来尚矣”。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宽，从文化学、地域学角度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由严家炎主编的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探讨区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成为一

①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页。

② 刘士林：《人文江南关键词》，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项值得注意的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丛书中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立足于上海近海、靠海、在地缘上开放最早、从而牵动中国走向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的现代素质，从与现代商业文明相伴而生的消费文化的角度，来评价海派小说。彭晓丰、舒建华的《“S 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学是如何诞生于“S 会馆”的有关两浙文学的起源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历史性考察。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则把江南文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了出来，系统地研讨了地域文化与地域作家之间隐于深层的双向联动关系，从而把江苏作家的创作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江南士风和文人文化传统的特定视角中进行深刻的阐释。此后，吴秀明的《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郑择魁《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高松年《当代吴越小说概论》、王嘉良《现代浙籍作家论丛》等著作，都对吴越文化地域文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浙江文学研究成果累累，王嘉良主编的《浙江 20 世纪文学史》、《“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相继出版；特别是浙东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尤其是浙江学者关注的“热点”。如《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论》、《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等发表于权威刊物的论文，就代表了当代学者对吴越文化与两浙文学特别是浙东文学的关注。浙西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作为在地域文学中别具一格的清流，也受到了理论界的关照。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将研

究视野聚焦于浙西这块被吴文化浸染的沃土，集中探讨浙西新文学作家这个带有鲜明吴文化特色的作家群体是较有意义的。

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指出：“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①从这一视角探究吴文化孕育的“水性”特质浓厚的作家群体，研究其某些带有共通性的创作风格与现象，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浙西新文学作家群是在吴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审视浙江现代文学作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浙东作家大多刚韧、劲直，文风多带“土性”，于是浙东就会出现两个特色鲜明的文学群体：乡土作家群和左翼作家群^②；返观浙西，如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等作家，大抵多情、浪漫，文风偏于温婉、飘逸，于是浙西就会有浪漫文学创作群体的形成。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并非单纯地理因素决定的，但如此显著的地域群体性现象的出现，却不能说与区域文化特质完全无关。的确，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风尚总是对作家的创作思维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

①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 页。

② 参见王嘉良等著：《“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3 页。

“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的影响，浙西作家亦然。综观郁达夫等浙西作家，在他们不同的文本深处，显示出共通的灵秀浪漫的阴柔风范。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综合着浙西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等多种“地域文化场”，与之相对应的吴文化精神蕴含其中。这种文化精神的体现，不仅体现在表象上的地域色彩，尤其凸现于内质表现上的地域性人文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风情、习尚、风光、山水等，更体现为具有地域特点的人文生存情状。由此，可以推论，浙西新文学作家群是一个带有鲜明吴文化特色的作家群体，其创作中所呈现出柔性的特质，受到深潜的吴文化精神的浸染，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吴文化这一通道，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的共同性。

二、吴文化与浙西现代作家的界定

对于吴文化地域的论定，一般是指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即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括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以及杭州、嘉兴、湖州以及长江以北的南通、扬州等地区的一个地域整体。所谓“浙西”，是历史上以钱塘江为界，江之东称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称“两浙”。人们通常将浙江的文化称为“吴越文化”，实际上，“吴”（通常指以太湖流域的苏南和浙西地区）和“越”（通常指浙东地区）文化本身具有很大的品性差异。一般而言，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浙东”为“越文化”范畴，而处于“浙西”的杭嘉湖则属于“吴文化”圈。

本书所涉及的“吴文化”的概念，是指以太湖流域包括苏南、浙西在内的这个区域偏重于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它泛指该区域人民自古以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精神风貌、行为特色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处于吴文化圈的浙西籍现代文学作家。其中包括土生土长、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吴文化区域的作家，如丰子恺、施蛰存等；更多的包括从杭嘉湖走出，在外域进行文学创作、取得巨大文学成就的作家，如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俞平伯、夏衍等。茅盾等浙西现代作家在“五四”以后的涌现，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不妨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正如郁达夫所说：“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艺批评家们）添加上去的，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似的。”^①

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可分两种情况：一是研究文学地域风格，研究某一地区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地方特色，即某一地区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独特风貌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另一种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地域的创作，虽未形成完整的风格或流派特征，但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共趋性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调，在创作上出现了相同相似的共同特征。这两种情况均可挖掘

^① 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艺文私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其地域性的内在的心理特征。

地域文化对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会产生久远而深潜的影响。深重的地域文化印记，常常是一个地区文学的独特标记。长期生活在吴文化圈的作家，一直承袭着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其作品往往带有一种先天的吴文化底蕴；至于后一种作家，他们虽然走出浙西，走出吴文化圈，在异质文化背景下与吴文化进行碰撞和融合，但童年印象对于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童年印象包括个体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熏陶，包括家庭的教育、生活环境的历史文化底蕴等。大量事实表明，个体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冰心曾指出：“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牢固地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① 由于处于多种文化的熏陶，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左右着浙西现代作家的文化意识，使得他们的文化背景呈现出多元的开放格局。浙西现代作家在价值观、艺术观、审美观等方面对地域文化的认知与超越，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动感，但在这不断变化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具有共趋性的，这就是地域文化的根。

^① 参见童庆炳等：《现代心理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3 年版，第 103 页。

由于吴文化内涵丰富和浙西现代作家文化性格的错综驳杂，又由于文化精神对个体性格的“模塑”又大多是潜移默化的，难以把握，因而要完全把握两者的联系很不容易。本书只是选择若干较为显著者略加检视，希望由此探究出其中的某些端绪。而且，本书所列的浙西现代作家仅仅是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虽说是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许多作家由于篇幅限制，就难以纳入视野加以细论。

三、研究价值和意义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论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① 丹纳认为，要研究艺术这片茂盛的鲜花，先要研究种子的种族及其基本性格，这些在祖先身上显露的特质，会随之一代代承传下来。一个区域的文化传统也是如此，它犹如深深埋藏的原始地层，不受时间的影响，始终存在。从地域的视角研究浙西现代作家，具有多方面意义。

其一，从纵向的角度审视，浙西现代作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在 20 世纪上半叶这个并不太长的历史间隙里，在浙江这一片并不开阔的地域范围内，积聚了丰厚的文学库藏。他们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他们的特色也是鲜明的，他们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和建设，具有择定方向和路标的意义，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①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1 页。